

移民、自由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历史

Fadi Bardawil Thomas Dodman Ian Jauslin
Pascal Marichalar Klaus Oschema Peter Redfield

2017 年 1 月 27 日,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来自 7 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旅游和移民. 作为对此事的回应,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的成员组织了一个历史工作组. 本文改编自他们于 2017 年春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通讯 (IAS Newsletter)》上发表的报告. 全文以及相伴的来自该研究院档案的原始资料的展示也发布在 IAS 网站和印刷版 / 电子版的小册子中.

1. 我们不确定的现在体现的创立研究院的道德观

在最为不祥的时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存在是重要的. 创建于大萧条时

期的前几年,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增长的极权统治的阴影下成形. 1939 年 10 月, 几乎刚好在欧洲爆发战争一个月之后, 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Abraham Flexner 发表了关于“无用知识的有效性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的宣言. 毫无疑问, 这是捍卫“无畏和无责任心的思想家”并且提倡知识和好奇心的自由表达的一个令人生畏的



图 1 Albert Einstein 与二战中欧洲犹太难民的一群孩子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Mercer 大街 112 号他的家中

译自: Notices of the AMS, Vol. 64 (2017), No. 10, p. 1160–1168, Immigration, freedo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Fadi Bardawil, Thomas Dodman, Ian Jauslin, Pascal Marichalar, Klaus Oschema, and Peter Redfield, figure number 5. Copyrigh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美国数学会与作者授予译文出版许可.

第 1 作者是 Chapel Hill 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人类学家和 IAS 社会科学学部的前成员 (2016–2017), 他的邮箱地址是 bardawil@email.unc.edu.

第 2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和 IAS 历史研究学部的前成员 (2016–2017), 他的邮箱地址是 td2551@columbia.edu.

第 3 作者是 IAS 数学学部前成员 (2016–2017), 他的邮箱地址是 jauslin@ias.edu.

第 4 作者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以及 IAS 社会科学学部的前成员 (2016–2017), 的邮箱地址是 pascal.marichalar@cnrs.fr.

第 5 作者是德国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的历史学家和 IAS 社会科学学部的前成员 (2016–2017), 他的邮箱地址是 klaus.oschema@ruhr-universitaet-bochum.de.

第 6 作者是 Chapel Hill 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人类学家和 IAS 社会科学学部的前成员 (2016–2017), 他的邮箱地址是 red-field@unc.edu.

时刻。

然而，这个时代的逆境也为这所羽翼未丰的研究院创造了机会，主要是来自德国大学系统高层梯队的著名且新近流动的学者们以突然的形式可资利用。在初期表现出犹豫之后，Flexner 在一些影响力的成员，特别是数学家 Oswald Veblen (维布伦) 的敦促下，设法为这些新难民中的一些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传统被 Flexner 的继任者 Frank Aydelotte 所继续。在与战时流离外国学者紧急委员会，Rockefeller (洛克菲勒) 基金会和 Carnegie (卡内基) 基金会的联合中，IAS 在这个有远见的，如果不是最出名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自研究院在 1930 年成立以来，差不多 9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在另一个不安定的接合点。从土耳其到美国，当权的全球政治力量正在对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性构成严重的威胁，正在削弱科学进步的两个基本条件。围墙，禁令，栅栏，限制，删减和驱逐正逐渐成为我们在日益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常用的词语。

旅行限制涉及纯粹的出生事件，标识国家的护照证件，促使今天我们重新去审视研究院的历史。我们寻求概述早期被排外的民族主义打断的学术生活和科学文化。由于努力给他们提供避难所，这些生活和文化设法自我修复并丰富了我们共同的人类遗产。

2. Abraham Flexner 的转变

在 1933 年 1 月底，Adolf Hitler (希特勒) 成为了德国总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纳粹党迅速行动巩固其政权，通过紧急法令扩大了行政权力，迅速成为形式上的独裁政体。4 月份的一项法令启动了对非雅利安血统或表现出可疑政治倾向的公务员的清洗。这个法令对德国的大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它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特别强的后果，在这些领域追求学术事业犹太人享有更好的前景。结果是，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个国家许多最强的知识中心失去了其领袖人物，其中包括著名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David Hilbert (希尔伯特)，Richard Courant (库朗)，Hermann Weyl (外尔) 和 Emmy Noether (诺特) 在这里任职。这场动荡突然产生难民学者寻求移民或不顾一切地在其他地方寻求职位的浪潮。这与 IAS 通过建立首个数学学院而从概念到一个具体的研究院的转变重合。

难民学者的危机给 Flexner 和 Veblen 提供了一个挑战性的机会。在 Hitler 掌权之前不久，该研究院已经在聘请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 和 John von Neumann (冯·诺伊曼) 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是在继续招募其他流亡者到什么程度呢？Flexner 最初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矛盾的心理，在完成创建计划的愿望和需要支持与培养本地才俊的关心之间难以决定。1933 年 3 月 27 日，他写信给 Veblen: “Bemerge 先生和 Fult 夫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担心，不应该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等方面做出区别，当然我完全同情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都不发展美国，那谁准备去发展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别人做多少？以及如何确保文明在美国的进步？”在 5 月 2 日，他再次答复 Veblen，他扩充了同一话题：“我们现在确实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无法照顾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我们受到来自国外申请的压力。对我来说，似乎清楚的是，我们首先要努力为自己国家在理论方面培养的人找到工作，做到如果他们值得，就会有工作在等着他

们。我们这样做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在某前仅限于为一些杰出的外国人提供工作，如 Einstein 和 Weyl...”

就 Veblen 而言，他表达了更加积极的立场，不仅主张研究院需要竭尽全力帮助所有人，而且支持建立一个正式的网络，为有需要的学者提供帮助。在 5 月 5 日，他写信给 Flexner：“一些委员会正在筹集资金，以使流离学者中的一些人可以在邻近德国或其他地方生活并继续他们的学术工作。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雄辩的抗议。”同月，位于纽约市的国际教育研究所成立了救助流离德国学者紧急委员会（后更名为包括所有的外国学者），由 Edward R. Murrow 牵头，帮助学者们逃离欧洲。之后不久 Veblen 也加入了该委员会。

在接下来的几年，Flexner 经历了一次转变，更深入地参与援助项目——他跟随 Veblen 加入了紧急委员会——并越来越愿意动员研究院的人一同做这件事情。在 1938 年写给哈佛大学的 George Birkhoff（伯克霍夫）的一封信中，他强调国籍决不应该阻挡更高的目标：“让我们坚定展望前方真正的目标，即数学的发展，这不是美国的数学或任何其他牌子的数学，只是纯粹的数学。只有拥有一流人才在重要的岗位上，才能发展数学，每当一个机构得到一个一流人才，他就会为其他的一流人才创造机会，每当形成一个这样的中心，就会促进其它的机构也如此效仿。Hitler 已让我们有可乘之机，而且仍然像疯子一样这么做。我对德国人民深感遗憾。我为美国感到高兴。对任何一个真正一流的美国数学家，我会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给他一个职位；同时，我也将为可能被 Hitler 解雇的任何一位一流的外国数学家做同样的事情。越多越高兴。”

在接下来一年春天 Flexner 的报告中，他甚至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知识地理中影响深远的改变的预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开创新纪元的时代。我们眼看着人类文化的中心正在移动。它的家曾经雅典。几个世纪后，它的家在意大利，几个世纪之后出现在巴黎，随后在英国和德国。而现在，它正毫无疑问地移向美国。欧洲的学者正在成为难民出逃，他们有的是出于政治或宗教原因，有的是因为他们太不幸而且被扰乱而不能追求他们献身的工作。他们到研究院的和与研究院联系过的确实有数百人。尽管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但我们依旧无法承担给他们位置或为他们找到地方。如果在今天我们以勇气和想象力行事，50 年后历史学家在回溯时就会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的重心越过了大西洋移动到了美国。因此，这是落在我们头上的一项重大责任。”在差不多 80 年后的有利位置来看，Flexner 的断言似乎比夸张更具预言性。尽管在更早之前科学著作就开始从德语转移到全球的英语，但文化重心的转移显然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之前领先的 Nobel（诺贝尔）奖份额大幅下降，美国获奖者人数激增（其中的 1/3 是在外国出生的）。

3. “一堵官僚措施的墙”

到达美国的实际过程对大多数将要移民的人来说并非易事，他们不得不航行穿过一个大洋，而且要通过大量文书获得必要的出入境许可。Flexner 和 Aydelotte 动用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关系并且穿针引线帮助他们。当数理逻辑学家 Kurt Gödel（哥德尔）在 1939 年

10 月得知他自己不能离开维也纳时，Flexner 联系了美国国务院签证处的主管，为他求情。虽然 Gödel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但因为他回到了曾经附属于奥地利的国家，在返回美国时获取授权面临困难。Flexner 问道：“国务院或总领事能为此做些什么吗？能建议某个有帮助的方法或程序吗？”美国官方回应，这个问题似乎与德国当局有关，因此 Flexner 的继任者 Aydelotte 联系了在美国的德国大使馆。最终 Gödel 和他的妻子 Adele 被允许离开。根据德国的指示，他们向东而不是向西行，通过穿越西伯利亚，最终于 1940 年到达日本，避开了英国对大西洋的监视，在日本他们找到了一艘去旧金山的船。Gödel 在一封感谢 Aydelotte 的信（图 2）中提到：“所有轮船局都告诉我，在大西洋上德国公民被英国人逮捕的危险非常大。”

即使难民成功抵达美国，他们也需要保持对官僚主义的警戒，并经常需要援助。根据 1940 年的外国人登记法，美国移民和归化局 (the 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收集了指纹，并要求外国人登记所有变更地址（图 3）。即使是在当地的旅游也需要许可，例如 Gödel，一旦最后定居在普林斯顿，在

1942 年 1 月与妻子一起去纽约市拜访一位医生时不得不请求许可。他们总是坐火车去，Gödel 向美国律师保证，并在同一天返回。3 个星期后，Aydelotte 的秘书发出了一份后续的请求，注意：“如果您能及时给予他们这种许可，这将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备受赞赏。”

该研究院最著名的流亡学者 Albert Einstein 在 1941 年 7 月 26 日写给 Eleanor Roosevelt (罗斯福) 的一封信中强调无休止的麻烦阻碍了欢迎外国学者的企图：“国务院正采取的政策，让美国越来越不可能对许多有价值的人提供庇护，他们是欧洲法西斯暴行的牺牲品。当然，为此负责的那些人是不会公开承认的。然而，正在使用的方法以保护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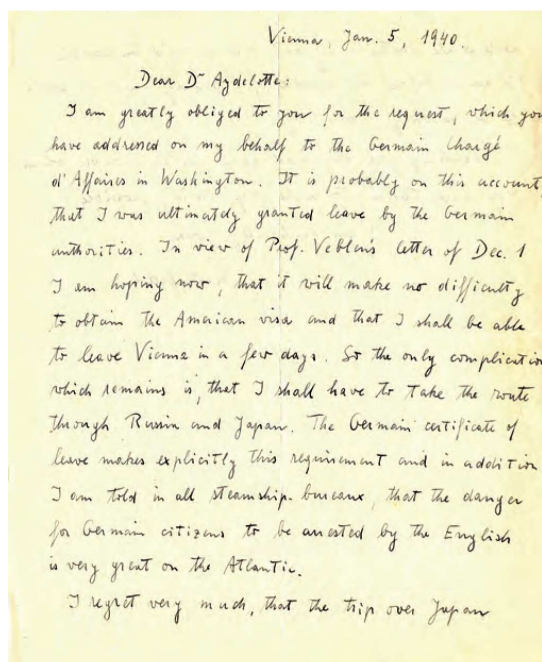


图 2 Kurt Gödel 1940 年 1 月 5 日致 IAS 院长 Frank Aydelotte 的信，对他和 Flexner 在 Gödel 获得离开维也纳的允许上的帮助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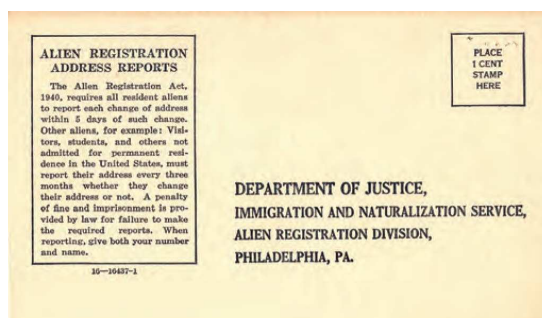


图 3 根据 1940 年外国人登记法，要求外国人登记所有变更地址，而且即使是在当地的旅游也需要许可

免受暗中破坏的，危险的分子为名，通过竖起一堵官僚措施的墙使移民成为不可能。”

4. 呼吁警惕

当我们沉浸在研究院档案核心的大量通信时，与像 Flexner, Veblen, Aydelotte, Einstein 和 Noether 这样学者所表达的紧迫感深深地产生了共鸣。他们的笔记和交流信件，不用提 Flexner 和 Veblen 服务的流离外国学者紧急委员会，表明当时他们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圈子。研究院历史的这一部分见证了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勇气，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并建立为流离难民提供避难所的机构网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克服了那些民族主义者将外国人，无论他们是数学家或是果农，视作威胁的狭隘的心理。他们行为的一个非预期的结果是，智力研究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丰富了这个提供庇护的国家。他们的个人的行动和集体机构建设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道德的坚毅不拔急需的典范。

这个故事也有黑暗的一面。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和 1933 年 4 月清洗非雅利安血统或表现出可疑政治倾向的公务员一项法令，就使德国的大学流失了许多最聪明的头脑和精神力量。当然，美国当前的政治局势离这种极端情形很远。但是，在面对诸如旅游禁令和移民驱逐出境的政策，以及试图遏制科学调查并且削减对艺术和人文事业的资助时，现在这些做法正威胁着研究的自由和对有尊严的人生追求，这段历史给我们的知识应当用于呼吁警惕。可悲的是，历史表明，毁灭所需的时间远少于建造。就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高等研究院可以在我们当代的困境中起到带头的象征作用。

5. Emmy Noether

对于 Einstein，她是“自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以来产生的最有创造性的数学天才”。与 Einstein 同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的 Weyl 的称赞则更直接，称她是“伟大的女数学家 [...事实上] 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数学家。”在 1935 年 4 月，Einstein 和 Weyl 都向最近逝去的一位同事致敬，她同他们一样在两年前穿越大西洋逃离纳粹的迫害。她的名字是 Emmy Noether，她的短暂而卓越的生命不仅在数学史上，也在 IAS 关键的头几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Amalie Emmy Noether 于 1882 年出生于巴伐利亚埃朗根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她跟随父亲的脚步在埃朗根大学学习数学，并于 1907 年成为从德国的大学在数学方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第 2 位女性。作为一位女性，Noether 在一个男人的世界中特立独行。在 1915 年被邀请加入——那时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系——哥廷根大学之前，Noether 没有报酬地教了几年书。她为其他教授们讲课，只是在 1919 年随着德意志帝国崩溃和彻底的大学改革，才通过她的授课资格



图 4 左：数学家 Emmy Noether，她被迫逃离哥廷根，作为访问者开始每周在 IAS 数学学部做一次报告。右：Oswald Veblen 写给 Abraham Flexner 的信，日期是 1935 年 2 月 28 日，涉及对 Noether 的 1500 美元资助

(habilitation). Noether 于 1922 年成为副教授 —— 德国第一位女性教授 —— 但她只是在下一年开始得到微薄的教学补助。

尽管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但她从未在哥廷根获得过长期的职位，而且随着纳粹党的掌权她的处境也变得极差。在 1932 年，她被邻居谴责为“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女人”，不得不离开她的公寓。接下来的一年，她被哥廷根大学解除了所有的教学职务，最终被迫像其他被清洗的学者那样逃离德国。(图 4 左) 由于救助流离德国学者紧急委员会的介入，Noether 能在 Bryn Mawr 学院得到一个临时的职位。一到宾夕法尼亚州，她就与在哥廷根以前的同事 Weyl 重新联系，他本人此时刚被其第一任院长 Flexner, 常任教授 Veblen 和 Einstein 聘请到高等研究院。

在哥廷根的那些年，Emmy Noether 已经成为了一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她在抽象代数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那里她确定了数系统的一个简单然而优雅的性质，它被证明在诸如素分解和维数这样的算术和几何对象的研究中是有效的。(Emmy Noether 对代数学的贡献请参阅边栏。(非本文正文内容，未译出。—— 编注))

Noether 在她开创性的物理学研究中也带来了类似的清晰性，这里她理解自然定律的对称性和“守恒定律”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例子，考虑“能量守恒原理”这个典型的守恒定律，它说一个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不能改变。例如，当汽车加速时，其能量增加，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意味着汽车必须从某个地方吸取能量(在这个情形，来自燃烧汽油)。另一方面，考虑“时间平移不变性”，即自然定律的一个基本的对称性，它说今天进行的一个实验如果明天进行，将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现在炮弹自由落体的速度和 Galileo (伽利略) 的时代一样。Noether 能够将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能量守恒来自时间平移不变性，而且反之亦然 (vice versa)。科学家早就知道能量和时间的关系，但是 Noether 第一个提出了系统对应性的理论：一般而言，对称性和守恒定律是相关的。这个想法是由于 David Hilbert, Felix Klein (克莱因) 和 Einstein 之间关于 Einstein 近来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概念的争论引起的。Noether 定理不仅平息了他们的争论，而且由于其引人注目的一般性，在物理学的许多其它领域，也许最著名的是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6. 重新思考 20 世纪 30 年代学者们的伊甸园

在 Veblen 接洽 Flexner 支持在美国的 Emmy Noether 的时候，她的名字在数学家中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他们的私人通信揭示了研究院在面对欧洲学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时，被迫调整了自己的使命。Noether 在 Bryn Mawr 的职位由 Rockefeller 基金会提供资金(作为他们为移民学者提供的 150 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但这只是暂时的职位。在 Veblen 的邀请下，她开始在高等研究院作为访问者在数学学部每周讲课。在那里，她成为了 IAS 的第一批成员。Noether 在高等研究院是幸福的 —— 而不是在她所说的普林斯顿这所“女性什么也不允许的男子大学” —— 但她没有为讲课收取任何酬劳，与其他 17 位全是男性的临时讲师不同，他们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在高等研究院讲课。另一方面，Veblen 确曾申请一小笔救助金，以帮助 Noether 在 Bryn Mawr 度过 1935 年和 1936 年，

理由是“Noether 小姐作为唯一的一流女数学家在世界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Flexner 同情 Noether 的困境，但担心研究院承担过多，他反复要求 Veblen 以管理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个问题。Flexner 想知道这样一个短期的承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并且表示担心研究院与其它德国学者比起来需要为她付出更多，因为研究院需要“注意不让人产生忽略美国人而去帮助不幸的外国人的印象”。Veblen 最终得到了 1,500 美元的资助，并继续争取更多的捐款作为“研究院的永久承诺”（图 4 右）。正如他所说，Noether 的独特之处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女数学家”，而且通过支持在德国的事件中被驱逐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她为研究院提供了利用从哥廷根流失的人才的机会。

换句话说，帮助处于危险中的学者，为新成立的 IAS 带来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和损失。尽管在 1935 年 4 月 14 日 Noether 的过早逝世之后，Flexner 本人逐步明白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受 Weyl 和 Einstein 感人的讣告的启发，他于 1937 年 6 月 2 日在 Bryn Mawr 做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是他长时间思索的一个想法，两年之后在《Harper》杂志上作为他的著名文章发表——的演讲中援引了对她的回忆。他认为，Noether“被逐出哥廷根，除了她是一个犹太女人之外没有更好的理由”，正如遍及全国的许多其他机构也冒险为其他学者所做的，Bryn Mawr“张开双臂欢迎她”。Flexner 总结道：“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化... 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文化发达的，只有在愚蠢行径为了新世界的一个新的开始而驱逐旧世界的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们时才变得丰富。”Flexner 的话语在今天大声回响，提醒人们研究院在富有挑战性的时代里是怎样找到一个新的存在理由 (raison d'être)，并作为一个警告：诸如 IAS，或者它之前的哥廷根，作为“学者伊甸园”是多么的脆弱和偶然。

7. Einstein, 水管工和 McCarthy (麦克阿瑟) 主义

在 1954 年 11 月，Einstein 给一份杂志写了一封信，其中他宣称，如果他又成为一个年轻人，他将不会试图成为一名科学家：“在目前的环境下，为了找到最低程度的独立性，我宁愿选择成为一名水管工或小贩。”遍及美国的水管工们回应了。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被提名为芝加哥水管工会的委员，而且纽约水管工 Stanley Murray 给他写了一封信（图 5）：“因为我的野心一直是成为一个学者，而你的似乎是成为一个水管工，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我们肯定将会非常成功。那时，我们既拥有知识，又拥有独立性。我准备将我的公司名称改为：Einstein 和 Stanley 水暖公司。”

不过，Einstein 只是半开玩笑地发表了他的想法。这位物理学家真心觉得，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正变得对科学家和教师越来越敌视。我们自己的困境与 McCarthy 调查的恐怖时期有许多相同之处：攻击学者，教师和新闻界的自由，政府工作人员的沉默和审查，美国被特定信念威胁的想法。为了最好地说明目前的形势，有必要描述过去事件的可怕后果，以及 Einstein 对他们富有洞察力的和勇敢的回应。

1950 年 2 月 9 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 Joseph McCarthy 宣布，他拥有国务院 205 名工作人员的一份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员。第 2 天，一名记者要求看这份名单。但是 McCarthy 找不到它；他的解释是，他把名单放到另外一件衣服里面去了。参议院成立一

个委员会调查这些指控,几个月后,委员会给出结论:McCarthy 的指控代表了“也许是这个共和国历史上半真半假的陈述和假的陈述的最恶毒的战役”。历史学家现在确信从来没有这样一份名单。

尽管如此,当时主流的共和党人却无视参议院这个委员会的发现。他们把 McCarthy 的策略看作是在 16 年缺席之后能帮助他们控制白宫的某种东西。他们邀请他参加会议,就政府最高层的“阴谋”进行指责。McCarthy 的助手还散发了一张被篡改了的照片,有意显示这个参议院委员会的领导人与共产党领导人密切交谈。

1952 年的选举对共和党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共和党得到了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参议员 McCarthy 的权力没有被约束起来。在参议院发言时,他把数百份文件堆在一张桌子上,声称他们含有渗透密谋的证据。没有人被允许检查它们。McCarthy 被提名为常设调查小组的主席,他把忠诚调查扩展到许多部门,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教育系统。正如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注意到的:“现在美国的整个教育行业都被威胁了。”

布鲁克林高中的一位教师 William Frauenglass 于 1953 年 4 月被传唤到参议院调查小组。在这个案件中,不忠诚的指控源于他 6 年前开的一门课程,这门课是教育部为其他教师们组织的会议上讲的。它被称为“跨文化教学技巧”,课程中回顾了“帮助缓解跨文化或跨种族的紧张关系”的方法。被该小组传唤的一名证人宣称这样的教学违背了“美国的利益”。Frauenglass 非常震惊,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许多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的创造时,想象一下这个指控!”这个老师也被问到他所属于的组织,而他拒绝回答。

Frauenglass 需要帮助并且决定向他非常敬重的一个人求助,这个人近来把他自己描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不遵循传统规范的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 Albert Einstein,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出名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战积极分子。Frauenglass 写道:“来自你的一份声明对于召集教育工作者和公众来应对这种新的蒙骗攻击是最有帮助的。”Einstein 帮忙了。他的 1953 年 5 月 16 日的复信——他说明此信“不用考虑保密”——被《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大幅引用:

“反动的政治家设法在公众面前用毫无根据的危险吓唬他们以灌输对所有智力努力的怀疑。目前他们成功了,现在他们压制教学的自由并剥夺所有不服从的人的职位,即饿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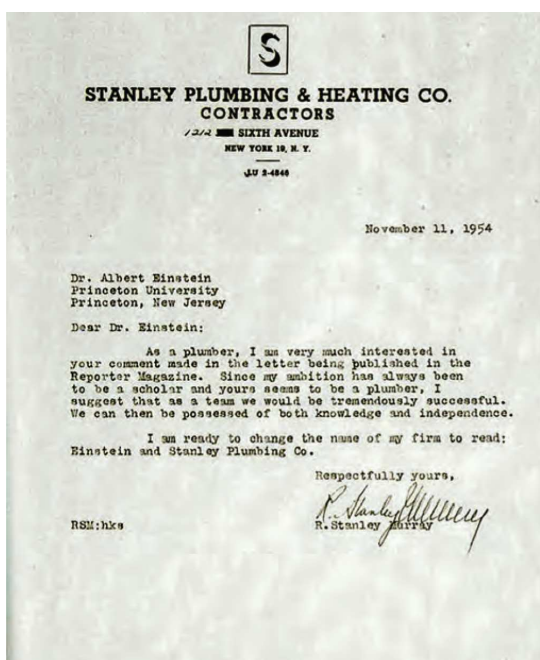


图 5 纽约市的一个水管工 Stanley Murray, 回应了 Albert Einstein 作为一个水管工的职业兴趣

Einstein 强烈建议这位老师不要再拒绝作证了. Einstein 写道, 他应该准备好 “为了他的国家的文化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这位物理学家补充说: “这种调查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愿意走出这沉重的一步, 他们将会取得成功. 如果不这样, 那么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会跟奴隶一样的惨”. 几天之后, 当 Frauenglass 和 Einstein 在普林斯顿会面时, Einstein 说自己为了这些原则已经准备好入狱了. Frauenglass 接受了他的建议. 正如已经预料到的, 他被解雇了, 但是却要因为一封 “历史性的信件” 感谢这位科学家: “它的回声仍在世界各地回荡.”

McCarthy 迅速对 Einstein 的立场做出反应. 他对媒体说, 无论他的 “名字是 Einstein 还是 John Jones”, 给出这种建议的人无疑是 “美国的敌人”, “不忠诚的美国人” 以及 “不是一个好的美国人”. 但是, Einstein 没有被吓住. 在律师们的一次集会中他发表评论, 继续批评现在政府的做法, “对其余文明的人类已经变得不可理解并且让我们国家受嘲笑”. 并警告说: “人权的存在性和有效性不是写在星星上的.”

Einstein 关心学术自由的缩减. 在 1954 年 3 月的一次公开声明中, 他为 “寻求真理的权利, 发表并讲授一个人信以为真的东西的权利” 而呼吁.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他感到遗憾的是 “教学自由, 相互交换意见和出版的自由, 以及其他交流的媒体都受到侵犯或阻挠,” 他补充说: “这是一个民主政府长期不能存在的事实.”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些声明是对 Einstein 的不忠和依旧是个外国人的证明 —— 他是在 1940 年被授予美国国籍的德国犹太人. 1954 年 3 月, 一位来自洛杉矶的妇女写信给高等研究院院长: “这个人需要上些美国主义的课. 我不耐烦这个想法: 一个人曾经做过伟大的事情或者发现过什么东西, 他就应该不遵守美国公民必须遵守的东西, 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有问题的行为负责.” 来自纽约市的一名男子更直截了当地说: “我建议他搬到俄罗斯 —— 越快越好! 我们不需要他.”

当时高等研究院院长 Robert Oppenheimer (奥本海默) 本人是 McCarthy 调查的对象, 他坚持支持他的著名的同事. 6 个月后的 1954 年 12 月, McCarthy 最终因为他之前的 “目空一切” 和 “应受谴责” 的行为而受到大多数参议员同事的 “谴责”. 当然, Einstein 的行为本身并不会导致 McCarthy 的倒台. 但是它们肯定为此有所推进, 通过重新强调回溯到启蒙时期的基本原则, 并让其他许多人为保护民主而持续斗争.

(舒晓波 译 赵振江 校)

(上接 384 页)

这是一个矛盾. ■

参考文献

- [1] W. Chinn, N. Steenrod, First Concepts of Topology.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1966.
- [2] M. Eisenberg, R. Guy, A proof of the Hairy Ball theorem, Amer. Math. Monthly 86 (1979) 571-574.

(陆柱家 译 陆昱 校)